〈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易杰雄主编李秋零田薇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
藏书

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

——文明在中世纪的艰难脚步

华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博采众长，加速文化现代化

代总序



几年前，在我国的报刊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批判西方价值观”。提出这种口号的人尽管动机是好的：担心西方一些腐朽的东西传进来，毒害我们的人民，引起我们的道德滑坡；害怕西方一些有害思潮影响老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的观念，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动摇。提出和拥护这一口号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爱国的。但是，由于“批判西方价值观”这一口号对“西方”一词缺乏严格界定，本身毕竟是一个未加分析批判过的口号，因而是一个非科学的命题，特别是如果真正按这个口号做起来，恐怕事情只能与口号提出和拥护者的愿望相反。因此，很有对它进行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

讲“西方价值观”，这里“西方”一词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呢？是就地域、方位讲吗？那么与之相对应自然就是“东方价值观”了。日本、韩国与我国同为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属中国领土，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要是一样，哪里还用得着什么“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宣传、提倡的价值观，与国家所反对的民主派人士、精英人物所主张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与几千年前我们老祖宗的价值观一样吗？也不一样。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由于地域相同，就认

定有共同的价值观呢？鲁迅先生在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就懂得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如果在地域、方位上使用“西方价值观”的提法，岂不表明我们连价值观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这一起码常识都忘了，连马克思主义重要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抛弃了？！

有人可能要讲，价值观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文化明显地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由东、西方两种文化派生出来的两种价值观怎么可能没有区别呢？如，一般认为：东方文化重道德，西方文化重科学；东方文化重感情，西方文化重理性；东方文化是人文的，西方文化是宗教的；东方文化重整体，西方文化重个性；东方文化重经世致用，西方文化重系统研究；东方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质，等等。不错，如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使用西方价值观，无疑是可以的。但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价值观”，难道西方价值观中重科学精神、重理性、重系统研究、重物质性的东西等等，也都是统统需要批判的吗？反过来，难道东方文化强调尊卑等级、重农抑商等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吗？结论只能是：如在文化渊源的意义上使用，笼统地提“批判西方价值观”是不对的。要么，就不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批判西方价值观”口号的提出者可能要说，他们是在承认价值观是一历史范畴，是随时代、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前提下，用它来专指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的。这样讲显然也有问题：既然承认人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而且事实上他们还处于快速发展中，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至今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就得承认他们的经济基础水平总体上还比我们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就不得不承认，其

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观念形态的重要要素的价值观，一般说来，从总体上讲也要比我们先进。这样，“西方价值观”主要就不应该遭受批判，而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了。

“批判西方价值观”这一口号，从策略上讲也是很不明智的。不错，西方一些领导人也常常使用“西方价值观”这一提法。其实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少数领导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如前所述，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也不可能有所有的人的价值观都一致。他们所以要这么讲，无非是为了标榜他们的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其实，我们的价值观主要是与西方领导人的价值观有区别，与西方各国广大劳动群众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对西方各国领导人、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与劳动大众的价值观完全不加区分，把整个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这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

“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不仅对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西方”一词未作界定，容易导致思想混乱，而且对“西方价值观”不加分析地都要加以批判，在理论上也包含着许多的错误。

首先，任何一种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无论是从文化渊源上讲，还是从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所对应的角度讲，作为某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产物与精神条件，必然是既有好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消极的、乃至需要抛弃的糟粕。“批判西方价值观”提法的错误就在于，不加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析地把自己价值观好的一面和别的国家与地区价值观有问题的一面都绝对化了，特别是没有从总体上加以比较，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事实上，一般说来，几乎可以断言，当一个地区、国家和社会还在健康、协调、快速发展时，它所对应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就还是有生命力的，好的，积极的方面一定是占主导地位的；当一个社会和国家停滞不前，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落后，说明与它相对应的文化及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定有问题，或过时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已经过时，至少表明，从总体上看它不如那些发展快的地区和国家的文化。

其次，有些价值观首先由东方提出，如“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有些价值观首先由西方提出和加以强调，如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精神，等等。这些不等于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东方价值观，重视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精神就是西方价值观。其实，它们都是全人类所向往、追求的共同的价值观。事实上，西方各国由于接受工业化过程不注意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教训，现在也很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注意防止和治理污染，合理使用资源，以保证可持续发展；东方人也很向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法治，也很尊重科学与科学精神。

价值观，作为人们对事物作评价和选取的一种思想倾向和标准，从来都是普遍与个别的统一。它必然既有全人类共同的地方，如凡正常人都要追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都崇尚真、善、美；又有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如东方人喜欢含蓄、稳重，西方人喜欢直率、豪爽。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共同的东西都是由广大老百姓提出来的，特有的东西往往是这些地区和国家内一些有特殊利益而

又对社会有控制权的统治阶级提出来的。他们以国情特殊把种种特有的价值取向强加到广大老百姓头上，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如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无一例外总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剥夺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的理论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否认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或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是全人类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过明显的表现：如无限夸大、抬高本民族文化，竭力贬低乃至诋毁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盲目地宣扬什么孔孟之道乃惟一科学真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他是人，迟早必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尧舜孔孟之道之外。邓嘉绩在《复扬辑庵书》中就是这样讲的：“中国之道如洪钟铸鼓，万物都归一冶，若五朝，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辩也，他时洋人终必如此”（《扁善斋文存》卷上）。

第三，“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出者还忘掉了这样的基本史实：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与公元前好多世纪前就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它不仅是历史上我国南北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更是我们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历史上吸收印度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和近代以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如科学思想等许多好东西的结果。把别人的东西看作都是应该批判和抵制的，把自己的看作都是最完美的，这样就势必使自己缺乏忧患意识，盲目陶醉于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思进取，从而不能虚心学习乃至排拒一切国外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丧失自我批判和创新能力。结果不仅阻碍文化自身的更新、导致其僵化、枯竭，还反过来成为社会进

步的绊脚石，导致误国害民。而且这种负作用还会与社会进步成正比。

最后，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南北文化的融合始有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等东方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始有东方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东、西方文化日益频繁、多方面的撞击和融合，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它具有人文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特点。所以在管理上表现出注重人际关系、具有家长制的特点。这种管理既有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鲜有明确、系统的规章制度和严格、明晰的计划、规划，主要领导人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对管理本身影响大的弊端，又有相对比较关心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利用人际关系挖掘潜能等长处。

而西方人受科学主义影响很深，甚至相信可以用数学结构来描述世界，相信精确的数量关系的描述是正确地进行决策和达到最大效率的基础。这种思想表现在管理上就是，他们把人员作细致的专业分工，把工厂的每项工作分解为若干部分，测定各部分所需时间，并设计出最佳方案，经理部门提前按计划确定每个人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人员之间如何很好地相互配合，以保证产品精密、准确，使零件达到标准化和具有可置换性，以及生产的严格同时化和连续高效进行。从而使组织高效率，决策科学化，并实现了专家统治。这就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这种管理的缺点是，把人变成了不过是按机器运转节奏活动的、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只服从某种固定的外在关系，劳动者被

看作只是能活动的物，只能靠高工资把工人留在高度紧张而又枯燥乏味的简单重复的机械运动中。

日本丰田英二吸取西方科层制组织形式和泰罗制管理经验，同时根据东方文化特点，鼓励职工加强联系，努力培养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强调人与人合作，人与机器优化组合，强调利润共享，以此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效益，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日本现代管理方式——即丰田英二的精益方式。这种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管理方式就是典型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产物——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的表现。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虚心学习西方，我认为今天已很难说日本文化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几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去的优秀人材都有，长期以来，各种文化撞击、融合，也已很难说是纯正的西方文化。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光纤通讯、无线电技术、英特网的迅速普及，正越来越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互相依赖正日益加强，各种文化的撞击和交融也空前加快，全人类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认同和尊重。少数国家少数统治集团为维护自己特权而提出的特殊理由越来越没有市场，以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哪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还想为自己的利益而为所欲为而要国际社会坐视不管已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还死抱着自己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放，而拒绝接受人家好的、特别是整个世界公认的通行的东西，以国情特殊为借口而游离于整个人类文明大道之外，连与其他国家沟通都逐渐成为问题，就更遑论紧跟时代前进了。

“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恰恰是既忘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又未能看清今天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

（三）

“批判西方价值观”口号的提出，是长期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主义”的表现。

早于公元前好多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就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有自己特色的华夏文明。当时由于这种文明发源早，总体上的确优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所以，华夏民族对那些居住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民族一律斥之为“蛮夷”。所谓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就是华夏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鄙视的称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民族和民族文化本位主义。这两种本位主义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直到明清之交，中国人还把远渡重洋而来的欧洲人士一律称之为“夷”。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仍把外交、外贸等涉外事务也一律称之为“夷务”。反映出来的仍然是对别国和外来文化的轻蔑和排斥——一种“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自尊自大的“文化本位主义”。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自觉地抛弃了对别的国家和民族不尊重的习惯称呼，开始用“洋”字代替“夷”字，用“洋务”代替“夷务”。1856年6月26日在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上也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自不得提书‘夷字’。”从此，“夷务”全部为“洋务”所代替，人们也广泛

用“西学”称呼西方文化。尽管一些顽固的文化本位主义者仍坚持西方不可能有什么学问：“西方所资以富强者，法也，术也，艺也，不足以言学也。”（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卷下）对他们来说，承认西方有自己的术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因为传统的看法是大中华以外的夷、狄、蛮、戎人，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

用“洋务”代替“夷务”，用“西学”称呼西方文化，是中国对中外文化相互关系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尽管“西”相对于“中”，相对于一贯以“中心”、“中央”、“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有一定的轻蔑之意。表明这时文化本位主义仍占主导地位。但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总是承认了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这是“天朝上国”观念的开始破灭。其中既有被迫改变的恼恨，又有向前艰难挪步的足迹。

后来，张之洞等人又开始用“新学”一词来代替“西学”，尽管“新学”一词在他本人那里与仍不及天朝文化的“西学”并没有多少区别，但到了通常按词义本身去理解的广大群众那里，“新学”已有了明显的褒扬之义，它含有赞赏、效法之意。它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旧学”来看的。事实上，“新学”提出、流行之时，也正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入的一个高潮期。因此，用“新学”代替“西学”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西方文化感情和观念上的进一步的变化。这也为后来反对旧传统文化，提出全面学习西方，打下了进一步的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的失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很快又是袁世凯称帝，张勋扶助溥仪复辟，封建主义的实质丝毫未改。官场照样腐败，国家还是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看清了，封建主义所以能苟延残喘，就是由于有作为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的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如故。因此，它还可以借尸还魂。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光是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甚至把它们移植过来，只要社会文化土壤不变，这些被搬过来的发展经济的方法、科学技术乃至政治体制就无异于桔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枳子。科学技术和经济还照样发展不起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仅限于换块招牌而已。于是，他们与袁世凯等复辟派“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针锋相对，发动了“五·四”运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科学与民主，提倡自由、平等、个性、人权、法治，宣传西方文化，提出要从经济到思想，从政治制度到文化来一个“全盘西化”。可见，提出“全盘西化”的基本含义就是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文化是互相制约的，它们只有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快速地、健康地发展。因此，学习西方不能只学习其中某一部分。提出“全盘西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充分地现代化”。这与反对派故意把它解释成仿佛中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了，把西方文化不管好坏一古脑儿都搬过来是不同的。与普通老百姓就字面上理解也是不同的。“全盘西化”论者也曾考虑到这一口号在受众那里可能引起的扭曲，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认为“全盘西化”并无不妥：“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胡适《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1935

年3月17日）其实，陈独秀、易白沙、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就都不同程度地表现过“全盘西化”思想。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向往“法兰西文明”转向追求“俄罗斯文明”，直到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向苏联一面倒”，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到“全盘西化”派中。因为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文明，也是一种西方文明。而且他们都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得很厉害的。当然，如果说“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主张的是中国实行欧美的资本主义，“俄罗斯文明”的提倡者是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之间又是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又出现过上海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样的事，他们提出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有的甚至主张“还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还不得不在宣言中声明“不守旧”，“不复古”。可见，文化本位主义顽固派在当时已经进步了的社会条件下，宣传传统文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批判西方价值观”的口号所包含的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看法与态度，不仅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与立场是一种大倒退，连把西方文化看作是“新学”的广大有识之士都不如。它在实质上与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是完全一致的。

（四）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其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对社会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能给社会以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会严重阻碍社会进步。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互协调、互相促进，才能健康地快速地向前发展。因此，学习先进应当全方位地学，而且应注意首先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观念。文化本位主义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极其有害。这是中国许多代爱国知识分子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才认识到的，也为中外历史，特另是近代以来中外历史的发展所一再证明。

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除少数极端顽固派，不少人都看到了坚船利炮的确优于大刀长矛，从而感到应向西方学习。但由于文化本位主义的“道本器末”论——即认为西方先进的器物“乃器械机巧之末”，“非立国之本”，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才是最了不起、最根本的东西——作怪，所以这种学习只能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水平上。你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可慈禧太后们要吃喝玩乐，所以把扩建海军的经费都挪用去修颐和园。由于政治体制问题未解决，注定了光想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的失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更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知“有洋务”，不知“有政务”是不行的，于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更根本的东西

——政治制度。在他们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实行变法，企图引入近代西方君主立宪制。失败后，孙中山又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国制。但是，紧接着袁世凯称帝，张勋扶助溥仪复辟。事实表明，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吗？可广大老百姓还希望有一个好皇帝。只要作为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的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如故，旧制度就还能复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改革都休想彻底，只能眼看着国家越来越落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才发动了“五·四”运动，向传统文化发动猛烈进攻，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很遗憾，这场思想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对外开放，虚心学习、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出现大好局面，什么时候文化本位主义膨胀，排斥一切外来文明，国家就急剧衰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特别是唐太宗推行儒、道、释三教合一、向外开放、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政策，从而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明末，特别是清初，由于康熙皇帝的提倡，西学传入中国一度出现盛况，所以紧跟着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虚心学习、利用国外一切好的、对我们今天还有用的东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相反，每当文化本位主义抬头、强烈排拒一切外来文化，甚至搞闭关锁国，就使国家停滞甚至倒退，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迅速下滑。美国一个经济史学家根据各国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分析，中国在1750年占世界的1/3，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一位。但在19世纪中国经济迅

速下降，1900年制造业下降到仅占世界的6%，1950年下降到仅占世界的2.3%。这与康熙晚年开始禁教到雍正继位（1723年）后发展为彻底闭关锁国政策，使西学早期输入完全终止，经乾、嘉、道绵延100多年时间，盲目陶醉于自己的文化，难道没有密切的关系吗？本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持平，到80年代末仅剩下日本的1/4，这种情况难道与这期间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恶性膨胀，自以为自己已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真理都在自己手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无关吗？！在人类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能出现文化革命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不幸事件，本身就证明我们的思想文化出了严重的问题。经济上，以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我们不足德国的1/54，日本的1/57。国家要赖以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呢？1999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以“ 科学的一个世纪 ”为题公布了100年来全世界100多件重大科技发现与发明，与中国有关的仅一项，即1974年中国农民发现了兵马俑。自诺贝尔奖设置以来，全世界大约已有近700人获得此项殊荣，像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卡文迪什实验室先后已有几十人摘取过桂冠，而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国大陆至今尚无人能问津过科技类奖项，尽管海外华人有过。我们的人文素质呢？发达国家平均5个人就有1名大学毕业生，有的国家已经进入“ 博士社会 ”，而我国，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文盲。我们各级政府的廉洁指数和办事效率又如何呢？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么，欧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斐声国际学坛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对有史以来21种人类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有些一度曾繁荣过的文明经过“死亡之门”已在世界上消失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停滞了。惟有西方文明直到20世纪上半叶尚未显露出丝毫解体的征兆，仍具有生命力。

这是不是他作为一名西方学者的偏见呢？很难这么说。

欧洲的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人口4亿多，如不包括东欧，仅3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7，只有中国的1/4。而它在全球国民财富排行榜前20名中，竟占有15名；在1994年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比较中，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欧洲就占了14名；世界经济论坛与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共同出版的199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根据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效率、金融实力、基础建设、科技实力、企业管理能力、人才及生活素质这8个方面综合考虑排出的竞争力排行榜，在前20名的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有13席；根据日本《东洋周刊》杂志报导，对全球55个国家全球信息建设指数进行比较，居世界前10名的国家中欧洲就占了8名；《科学观察》的统计资料显示，对全球20个发达国家1992-1996年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进行比较，前10名中欧洲也占了8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的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人文发展指数前20个最高国家和地区中欧洲也占了15个；透明度国际组织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廉洁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廉洁度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就占有7名。不仅如此，曾经两度引发了世界大战这种惨剧的欧洲，通过吸取历史教训和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已从法德的“煤钢联营”到“欧共体”又进一步发展到“欧盟”。这些国家的国民在欧盟范围内不仅可以自由来往，还可像本国公民一样在别的国家找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